



为了庆祝今年的第一场雪,爸妈约我去丰峪爬山。

住在秦岭附近,爬山是我家的传统保留娱乐项目——春天来了,去山上赏花;夏天了,进山去避暑;秋天了,去山里登高看红叶。冬天也要找借口上山,比如下雪了,去山里看雪景。比如我妈打电话跟我说的理由是“你爸是觉得带你姐姐上山了,没带你,所以这周就把你带上”,把我逗笑了,爸妈这年纪,要带,也是我们带他们了。可是无论我们多大,爸妈也会觉得是他们在“带”我们出去玩。

还有他们习惯说的“你爸觉得”或“你妈觉得”都是他们自己觉得,又不好意思说,就借对方的口来表达,比如我爸也悄悄跟我说“你妈今年很开心,我们都过了73岁了,只要你们开心、高兴,你妈就高兴,身体就好……”

老爸把车一路开到分水岭,刚下车他俩就吵一架,因为上来得太早,山顶特别冷,我妈想打开车门拿件衣服,但无奈车钥匙在我爸口袋里装着,他一离开车,车就自动上锁了。而我爸此刻正在200米外跟新上来的一辆大巴车司机搭讪,我妈最讨厌我爸这种自来熟爱热闹的性格,不止一次出门为他这种“爱跟不想干的人没话找话闲聊”而吵架。我爸忙着跟人说话,没听见我妈说要开车门的要求,我妈又冷又气,待我爸聊完转回来打开车门,她已经憋了一肚子气,劈头盖脸地谴责我爸,她

摆事实讲道理说得激愤,扯出很多新旧旧恨,最后给我爸下了个结论“对外人春天般的温暖,对自家人秋风扫落叶样冷酷”。

给我爸贴完标签,我妈就自顾自往山上走去,全然不管我爸在后面准备热水、登山杖、背包……我爸好像也习惯了,默默在后面收拾。给我使眼色叫我跟上我妈,怕雪大路滑把我妈滑倒了。我一边追上去,一边在心里笑我妈脾气一上来就像个任性的小公主一样。

山路的危险使得我妈很快就忘了生气,用她的话说,恨不得再多长出几个脚趾头扒着地。她不由自主掏出电话给我爸打电话:“山陡得很!有90度,我几乎和山平行着爬呢!”我逗她说“你俩刚才不是吵架了嘛,你说不带他玩儿了,还给他打电话干啥?”

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全然忘了吵架的事。我爸用手机放着歌儿,边走边听,我妈感慨说:“哎呀,空气多好呀!上山就是要把怒气、病毒、不高兴,所有的坏事情都放出去,放到山里……”

我爸接话说:“我就把你刚才骂我的话放了。”

我妈说:“那你最好把你以后的骂人话都放到这儿!”

听得我忍俊不禁,听他们的语气好像两人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挨

“你是我的佛”

肖遥

了欺负,可这一起过了几十年,到底谁把谁给欺负了呢?

话说二老反应都够快的哈,都是怼人能手,针锋相对。除了互怼,爸妈也会互夸互捧,比如走到特别滑的路上,我妈给自己打气说“佛保佑着我们呢!”

我爸在后面说:“明明是我保护着你呢!”

我妈说:“你就是我的佛,我也是你的佛。”这简直是我听过最动人最朴实又最深挚最艺术的情话。

走着走着,路过几个人正坐在雪地上休息、吃东西,山路上人迹罕至,遇到个把人就特别新鲜。我爸爱搭讪的毛病又犯了,跟他们打招呼:“你们吃什么呢?”他们说在吃牛肉,给你一块吧?我爸说不用了……

走过这几个人后,我爸说其实很想接过牛肉,因为我妈低血糖,肯定饿了。

走在山里,白雪皑皑,却一点也不觉得冷,太阳出来了,更高的山路上,是雪覆盖着冰,不是一般的难走,走上一会儿,我妈就像个孩子一样举起手杖欢呼“胜利喽!”

我爸笑话她天天说胜利了胜利了……这一年,他们又参加了几场葬礼,送走了两位同学和两个同事,还有我大舅,甚至我表妹……没有谁能比古稀之年的爸妈更懂得生命的珍贵。

所以,对于爸妈来说,种了一畦菜是胜利,画出一幅画是胜利,爬了一座山是胜利,甚至,每天睁开眼发现一切都好,就是胜利。胜利其实就这么简单,活着,并且按照自己的心愿开心地活过一天,就是胜利。



肖遥, 周刊专栏作者, 曾为《中国新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读者原创》《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等刊物供稿, 曾为新华网、南方周末、羊城晚报、安庆晚报、合肥晚报、西安晚报、温州都市报等全国20多家媒体写专栏, 中篇小说见于《延安文学》等刊物, 出版随笔集《酱醋茶扮成诗酒花》。



韩玉霞, 黑龙江人, 南开大学历史学硕士。曾任天津人民出版社编审、文史编辑室主任, 天津市编辑学会秘书长。现为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产品质量检测专家委员会委员, 天津市和平区政协常委、文化文史委员会主任。

我出生在黑龙江北大荒, 在那里长到十八岁。北大荒的冬天, 大雪覆盖长达半年, 莽莽天地之间, 是刺眼的白、彻骨的冷。我对雪的记忆, 不只是一场两场的概念, 它凝聚了我一半的乡愁。故乡的雪地上, 印着我求学之路的一串串脚印……

我在村里的小学上到七年

北大荒的雪印

韩玉霞

级。学校在村子最南边, 有两栋校舍, 离住宅区大概有四百米远, 有一条孩子们踩出来的羊肠小道。冬天, 学生轮流做值日, 去班级生火。一次轮到我值日, 早上五点钟我就起床了。一夜暴风雪, 家门被大雪封住, 用力反复推关好多次, 才勉强推开一人宽的缝, 我侧身挤了出去。

屋外是零下30多度的凌晨, 雪已停, 天边寒星闪烁, 整个村子都没有路灯, 借着雪光, 踩着没膝深的雪, 我一步一陷地朝着学校的黑影跋涉而去。到了教室, 围巾、皮帽子、眼睫毛上, 全部结了厚厚的雪霜。打开昏黄的白炽灯, 倒出鞋篓里灌的雪, 开始一通忙活。不到半小时, 火生起来了。教室里有了烟火气, 是刨花劈柴燃烧的木头香味, 后来添上黑亮闪闪的大煤块, 又有了煤烟味。火苗呼呼地蹿着, 红黄的火光, 从炉盘一圈圈的缝隙中闪出来, 照着我的小脸, 因为先冻后烤, 小脸热得发烫。

当时我也就十来岁, 记不得爸妈的担忧和心疼, 我自己也没觉得害怕和委屈, 对于北大荒的孩子来说, 生炉子的活儿那是不在话下。这就是七十年代的北大荒, 我的童年。

1978年, 我读初三, 学校离家

约二十多公里。那一年冬天, 学校批准我入团, 申请表中有关于父亲履历的内容, 为了填写准确, 我连夜骑车回家。已是深冬, 大雪覆盖着茫茫的田野, 道路上叠加着一场场的积雪, 反复碾压, 已经跟冰镜一样光滑。天边有一轮弯弯的上弦月, 路面反射着冷冷的月光, 指向远方。这是夜晚乡间的道路, 没有路灯, 没有行人, 也没有村子, 还得翻过一座林木茂密的小山。当时的我很高兴很激动, 根本不知道害怕。

我戴着皮帽子, 裹着棉衣棉裤, 骑在自行车上, 缩成圆圆的一团, 跟马戏团的狗熊差不多。干硬冰冷的路上, 只要车轮碰到一点异物, 自行车就会咣当摔倒。一路上, 不知摔过多少次, 但我并不记得疼。车把摔歪了, 我就用双腿夹住前轮, 拧正了车把再接着骑。就这样, 在夜色中, 在冰路上, 一路摔一路骑, 到家时, 头上、身上, 全都冒出热腾腾的汗。

那年我十四岁。

读高中时, 离家三十三公里。那时农场只有一辆大客车, 一条公交线, 大风大雪的恶劣天气, 公交车便会停摆。

高二那年的冬天, 下了一场特

别大的雪, 连队的学生们因为双休假, 都被困在了家里, 可是学校周一的课照常要上。怎么办? 当时我姐在场部小学当老师, 于是, 我和姐姐、同学小勤和爱花四人决定, 一起结伴走路回场部。

那是周日中午, 道路上有的路段积雪很深, 有的路段光滑如镜——雪被大风吹跑了。我们一会儿蹬雪, 一会儿在冰路上亦步亦趋, 不停地摔跤, 身体很快便达到了疲劳的极限, 喉咙干, 心脏跳, 呼吸困难, 浑身热汗。我们四仰八叉, 躺倒在雪地上, 翻身拂去雪的表面, 捧起一把白雪塞到嘴里, 嘎吱嘎吱地嚼起来。

笔直的道路, 指向天边的小云山。远望着山尖, 和山脚下那片灰砖红瓦, 我们歇一会儿走一气, 最后绝望得谁也不说话了。四个女孩子, 闷着头, 深一脚浅一脚, 趑趄着, 机械地迈着腿……

走了一下午, 终于到了场部。天早已经黑了, 场部灯火通明。因为垂着手走了几个小时, 手冻得肿痛的, 五个手指只能直直地伸着, 没法打弯, 不能握住任何东西。第二天早晨起床, 大腿疼得下不了地, 一个多星期, 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

那一次, 我们几个离学校最远, 却是唯一走回学校的学生。我的同桌考上了师范, 后来一直在中学当校长, 他跟我说, 每次开学典礼, 他都会讲我这个励志故事, 教育孩子们要拼搏。其实我自己, 从当时到现在, 都没觉得苦。